世界与中国前沿问题

国家软实力

超越经济和军事的第三种力量

NATIONAL SOFT POWER

研究国际和地区问题的独特视角和方法

赵 刚 肖 欢 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家软实力

赵刚 肖欢 著

新世界出版社

前言

“软实力”[①]（Soft Power）一词自 1990 年问世以来，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大众的生活领域都已流行开来，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在当前正处于全球经济危机的时代，软实力这一超越了传统的经济和军事的力量，更凸显其独特的作用，成为世界各国追逐和争夺的新坐标、新高地。2009 年 4 月召开的G20 伦敦金融峰会中，自二战以来一直为美国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国际金融体系受到了质疑和挑战。长期以来，美国凭借其在国际金融体系，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主导权，利用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优势，通过滥印钞票和美元贬值的方式转嫁危机，将众多拥有庞大美元资产的债权国“绑架”。在此次峰会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提出了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以“超主权储备货币”来告别美元时代的构想。虽然，美元时代的结束尚需时日，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有待继续提升，但此次G20 峰会上的交锋，正是各国对于国际制度掌控这一软实力竞争的生动写照。

软实力理论为人们研究国际和地区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在信息时代的今天，软实力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必将对国际关系产生更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软实力是认识的“过滤器”。以文化为主体的软实力对国家领导人、国家决策有重大影响。各国领导人主要通过本国文化观念的棱镜分析问题和做出决策。这种文化差异反映了他们的价值、观点、利益、习惯以及愿望和忧虑。如果不能正确评价这些差异就会导致错误的理解和错误的判断。

其次，软实力是决策的“导航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战略重点，它来自该国早期的经验，并在某种程度上受其国家或精英的哲学、政治、文化和认识特性的影响。文化观念强烈地影响着国家领导人对政策问题的看法，从而影响决策过程。无论是个人或领导集体，都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以其文化观念作为他们的选择坐标。因此，以文化为主体的软实力对国家领导人在解决各种国际问题时具有重要影响。

[①]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该词的翻译不尽相同，主要包括：“软实力”、“软权力”、“软力量”以及“柔性国力”等。之所以产生不同的译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同的学者对于“Power”一词有着不同的理解 “Power”的意思可为权力、实力、力量、权势、大国。由于本书所论及的“Soft Power”主要是从国家行为体的角度上审视，主要考察其在国家综合实力中占据的位置与发挥的影响。因此，本书统一将“Soft Power”译为“软实力”，以和综合实力、国际实力等称谓保持一致和连贯。

第三，软实力是促使国际关系趋向融合的“推进器”。尽管不同的社会结构千差万别，但是一切先进的经济特征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如中央银行、财政部、各种研究中心、各种水平的学校以及军事等组织体系，还有成千上万的其他相应机构。信息技术的应用及其对社会影响力更是令人震惊。这种世界文化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强大的驱动力，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基于上述观点，有理论认为，在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一种强劲的统一与和谐的文化融合倾向。这种倾向在工业化时代已经显露出来，在信息时代则更加明显。

第四，软实力的相互竞争是国际关系潜伏冲突的“基因”。在“文明冲突论”中，塞缪尔·亨廷顿提出，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导致人类大的分裂和冲突的支配根源将是文化因素。全球的主要冲突将会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冲突将支配全球政治。亨廷顿所说的文化差异，即不同的软实力，会导致冲突，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因为冲突的根源与文化基因有关，但不能因此把文明的冲突扩大化、绝对化。

本书之所以将软实力作为研究的对象，还是因为对冷战后国际形势变化所做考察的反思。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拥有举世无双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但是这种硬实力方面的绝对优势并未能给美国带来绝对的安全——“9·11”恐怖袭击便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中硬实力的胜利却导致其国际形象受损，影响力和公信力降低。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获得前所未有的提升，但是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却产生了忧虑和恐惧，“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不绝于耳。凡此种种，除了外界的因素之外，一个重要的内部因素就是国家软实力的下降或缺乏：美国冷战后对公共外交的忽视、单边主义外交路线的实施以及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的制定，损害了长久以来积累的软实力；中国一贯重视经济等硬实力的建设，但相对而言对软实力的提升缺乏有效而系统的战略。

基于以上软实力对国际关系及国家总体发展的重要影响，本书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软实力理论进行系统地梳理，特别是对国家软实力的构成、国家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相互关系等重要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回顾和评估亚太地区主要大国软实力发展的历史变迁，以试图为正处于和平崛起的中国提供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途径和策略，这也是本书的重要意义所在。

国内对于软实力的研究始于王沪宁先生在 1993 年《复旦学报》（社会科

学版）[①]上发表的《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在该文中他第一次详细介绍和论述了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具体分析了组成软实力的各个因素（政治系统和政治领导、民族士气和民族精神、国际形象、对外战略、国际体制、科学技术等）以及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差异。此后，庞中英教授在 1997 年发表文章《国际关系中的软力量及其它》[②]，对奈的著作《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进行了评述。他文中介绍了信息时代下作用不断突出的软实力，认为各国应该利用自身的资源，转化为可在国际关系中利用的软实力。他指出，除了传统文化外，亚洲国家的发展模式亦是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应当建设适应当今时代的软实力。从此，国内学术界对于软实力的研究逐渐升温，涉及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据不完全统计，从 1993 年至 2006 年，国内学术刊物共发表关于软实力的论文约 128 篇[③]，内容涉及软实力理论的由来、软实力与文化、软实力与公共外交、软实力与中国的和平崛起等各方面。总体而言，主要观点包括以下数点：

第一，关于软实力理论的由来。有学者认为，奈的确是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的国际政治学者，但他并不是认识到软实力重要性的第一个学者。实际上，第一个提出并比较系统地讨论软实力但没有使用这个概念的是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葛兰西那里，软力量表现为意识形态和文化。在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意大利的政治进行考察后，葛兰西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最有效的统治工具并非是诸如武装部队和警察的硬实力，而是其占霸权地位或上升至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葛兰西讨论的是软实力在国内政治中的作用，而奈则把此扩展到国际政治。[④]另外有学者认为，约瑟夫·奈软实力的概念是受著名政治学家彼得·巴克莱奇（Peter Bachrach）和摩尔顿·拜拉茨（Morton Baratz）文章的启发提出来的。他们在上一世纪60年代提出了“权力的第二张面孔”（second face of power）的思想。这两位政治学家于1962年在美国的《政治学评论》（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发表了《权力的两张面孔》，1963年又在同一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决定与非决定：一种分析框架》，提出和分析了权力的“同

[①] 王沪宁：《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 年第 3 期。
[②] 庞中英：《国际关系中的软力量及其它——评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注定领导》，《战略与管理》，1997 年第 2 期。
[③] 通过中国期刊网对“软实力”、“软权力”进行检索、挑选得出的数据。
[④] 郑永年，张驰：《国际政治中的软力量以及对中国软力量的观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 年第 7 期，第 7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化”（co-optive）属性问题。[①]

第二，关于软实力的构成要素。软实力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它由很多方面组成。我国学者黄硕风认为软实力应包含政治力、文教力和外交力等三方面，属于综合国力的无形构成，这些软实力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内部软实力如制度创新、人力资源、文化辐射力、凝聚力与亲和力、高科技研发能力，以及外部软实力如国家形象、国际机制的控制力、国际规则的创制力和国际义务的承担能力等。其中尤其以政治体制、核心价值观、国家认同和凝聚力等非经济因素作为国家综合实力或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②]在庞中英看来，软实力的构成包括：非物质性的、无形的力量，包括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吸引力；国际结构性力量，旨在安全、生产、金融、知识等国际结构中拥有的实力；与军事或者战争力量不同的外交（主要是谈判)实力。此外，承载软实力的工具也是研究软实力不得不考虑的问题。[③]贺颖等学者将软实力的主要构成要素归结为六个方面：文化；知识、信息和科技力；国民的整体素质与民族的凝聚力；制度的创新；国家发展战略及决策机制、外交和领导者的领导艺术；吸引力。[④]宋效峰将软实力的构成分为：凝聚国民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文化、教育、大众传媒和参与、掌控国际机制的能力，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发展所需要的软实力因素进行了探讨。[⑤]

可以看出，尽管以上关于软实力构成的论述有些不同，但是主要内容具有相似性，特别是强调文化、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的重要性。

第三，关于软实力与文化。文化是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但是并非所有文化都可以转化为软实力，它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文化的传播能同化他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他人观念的同化有助于本国目标（所推行的政策或所主张的规范、制度）的实现；在通过文化同化实现本国目标的过程中，国家的控制力得到增强。[⑥]

在文化的范围上，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国家制度虽然表面上各成体系，但是都属于文化范畴，认为文化力是“相对于经济力、政治力、军事力等而言，指一个国家文化发展和文化积累所形成的现实力量，既包括这个国家文

[①] 刘德斌：《“软实力”说的由来与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 年第 4 期，第 56 页。
[②] 黄硕风：《综合国力分析》，《中国军事科学》，1989 年第 3 期，第 32 页。
[③] 庞中英：《中国软力量的内涵》，《瞭望》新闻周刊，2005 年第 11 期，第 16 页。
[④] 贺颖、周际翔、项玫：《浅析国家软权力理论》，《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5 年第 2 期，第 23 页。
[⑤] 宋效峰：《试析中国和平崛起中的软权力因素》，《兰州学刊》，2005 年第 3 期，第 15 页。
[⑥] 陈玉聃：《论文化软实力的边界》，《现代国际关系》，2006 年第 1 期，第 57 页。

化积累和发展的现实水平，又包括它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作用力、影响力和辐射力”。[①]这一观点认为，软实力的基础是文化和文化力，与约瑟夫·奈所说的其他软实力来源并非出于同一个层面上。在此基础上，软实力的运用必须遵循以下准则：（1）重在感化而非同化；（2）着眼于长远利益；（3）政府与民间同时进行。[②]

第四，关于软实力与国家利益。软实力可塑造人们对国家利益的共识，影响人们对国家利益追求的行为模式。在实践中，确定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主观判断，而主观判断必然受制于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软实力因素。正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国家利益的决定，从一个国家内部观察，事实上表现为一种‘平行四边形的合力’，是社会生产方式和国家政体形态含有的所有因素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结果。”[③]还有学者认为，软实力正在直接影响或参与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外交目标、决策以及外交政策的实施。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三个途径来实现：一是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内容和目标，因为在国际关系中决定国家外交政策的并不是绝对客观的国家利益，而是决策者以意识形态为思想框架和观察工具所认识到的国家利益。二是影响对外政策制定的机制和过程。例如，法国的外交机构和决策过程具有法国文化的特点。三是影响国家外交政策执行与实施的方式和手段。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和交流过程中产生的行为和艺术的外交是由代表国家的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一种社会现象，构成软实力的诸多因素极大影响着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交流的方式和手段。[④]

第五，关于软实力与公共外交。公共外交作为软实力的组成部分，是传统外交的重要补充，在国家外交战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约瑟夫·奈认为，公共外交的价值不仅在于能够实现特定的目标，而且具有惠及所有国际事务的潜力，是完成一国长远战略目标必不可少的手段。

公共外交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公共外交可为国际互动创造信任机制。公共外交在现代外交政策体系中的作用日益显现，主要在于它被视为一种在国外培植相互信任和理解的有效工具，其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向国外民众展示本国的正面形象，感化国外民众，以对本国形成亲和力。第二，

---

① 郭洁敏：《论软实力的基础、条件及其运用准则》，《现代国际关系》，2006 年第 3 期，第 58 页。
② 同上，第 59 页。
③ 王逸舟：《国家利益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2 期，第 161 页。
④ 章一平：《软实力的内涵与外延》，《现代国际关系》，2006 年第 11 期。

作为一种“软性”政策，公共外交是为一系列硬性目标的成功铺路，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带来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过去仅仅通过经济手段追求经济利益的做法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已不再流行。信息、文化交流与经济领导人在私人层面上形成的亲密文化关联，尤其能促进政府间的经济合作，并加强商业部门和国外民众的沟通，使之接触新的信息和教育资讯，催生充满活力的大众消费社会。国家可以借助这一政治色彩相对较弱的外交形式塑造有利的宏观经济结构。

第六，关于软实力理论的启发性探讨。自软实力理论引入中国以来，受到中国学者的高度关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强调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性。学者们认为，重视发展软实力，有助于全面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重视发挥软实力的优势，有助于国家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的目标；强化对软实力的认识，有助于防止别国以软实力为手段进行对我进行和平演变。[①]许多学者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用软实力理论来探讨中国崛起的有关问题，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相比，差距最大的不是国内生产总值和军事实力，而是各种软力量。相比之下，软力量比硬实力更为重要。能否强化和解决软实力，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强国战略的必经之路。[②]

二是批判美国的“文化外交”，用软实力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认为这是实施和平演变的手段之一。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不断蔓延表明，西方社会思潮与软实力理论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软实力思想正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新手段。[③]

三是关注我国的软实力建设，这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有学者提出应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构建文化安全战略，为此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站在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对中外文化成就进行辨别、创新和发展，建立有效防备预警机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民族文化体系。[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在海外拥有庞大的华人网络和社会联系，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与发展模式以及中国本身的硬实力等，使得中国拥有丰厚的软实力资源。与此同时，当前中国的软实力的薄弱严重制约了中国

[①] 贺颖、周际翔、项玫：《浅析国家软权力理论》，《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5 年第 2 期，第 26 页。
[②] 张才国：《软权力与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学习论坛》，2006 年第 1 期，第 109 页。
[③] 赵刚：《全球化时代的软权力与文化安全策略》，《国际论坛》，2004 年第 3 期，第 40 页。
[④] 刘瑜：《全球化视野下的软权力暨中国软权力探析》，《兰州学刊》，2005 年第 3 期，第 23 页。

的发展及其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高，因此中国还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将软实力资源转化为现实的软实力。[①]

此外，在国外学术界，人们对于软实力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约瑟夫·奈在 2004 年发表了关于软实力的新著《软实力：世界政治的制胜之道》(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②]，更为系统和全面阐述了作者对于软实力的见解。奈在该书中完整地论述了软实力的定义、来源、局限，对美国、欧洲、亚洲地区的软实力资源进行了介绍，提出了如何运用软实力的建议。该书的出版标志着软实力理论的正式形成。2006 年 2 月，奈又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发表名为“软实力再思考”[③]的论文。在该文中，约瑟夫·奈集中回答了软实力是否就是文化的力量、经济实力是否就是硬实力、软实力是否比硬实力更人道、软实力是否可以衡量、军事实力是否能够产生软实力等重要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他的软实力理论。

在内容的编排上，本书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章关于软实力理论，在对软实力因素进行了历史探源后，介绍了软实力理论产生的国际背景和形成历程，详细阐述了软实力的类型、特点及其重要性。最后，本书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将现实主义理论、结构实力论与软实力理论进行了比较，并批判了软实力理论的不足。

第二章关于国家软实力的构成，以国家行为体作为分析对象，分别论述了国家软实力的基本构成，包括文化、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对国际制度的掌控等。

第三章关于国家软实力与硬实力，主要探讨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组成部分的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回顾了国家实力的历史变迁以及软实力重要性的不断凸显。在论述了软实力与硬实力的辩证关系后，又对两者之间存在的灰色区域——国家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软实力，分别进行了阐述并对冷战后美军的软实力建设做个案研究。

第四章关于国家软实力的评估及其他因素，以学术界对于国家实力评估的方法为基础，通过对中美两国软实力的纵横对比，寻求和发现国家软实力上升或下降的规律。之后，对与国家软实力相关的国家形象和大众传媒等重要因素进行了探究。

---

① 何增科：《全球化对国家权力的冲击和回应》，《新华文摘》，2004 年第 3 期，第 43 页。
②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③ Joseph S. Nye Jr., “Think Again: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Jan/Feb. 2006.

第五章是关于对亚太地区主要大国软实力剖析，根据软实力理论，本部分对亚太地区的主要大国美国、俄罗斯和日本的软实力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包括历史变迁、软实力的构成以及不足等。

第六章关于中国软实力的剖析，回顾了中国软实力的历史演变，详细阐述了组成中国软实力各个因素，对汶川地震救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行、食品安全问题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个案研究，对大陆和台湾的软实力进行了对比，并分析了中国的和平崛起与软实力建设的相互关系。

结论部分，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大框架下，给出了如何提升中国软实力的理论和实践策略。

需要说明的是，直到本书完成之时，人们关于软实力的讨论依然在继续。因此，我们衷心地希望，本书能够发挥抛砖引玉的作用，能够为学术同仁和广大读者对该问题进行更为深入地研究和思考提供有益的帮助。此外，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专业研究生刘志良、秦卫海、尚玉婷、董阳春、高扬、张新晶承担了相关章节的材料收集和初稿工作；林源园、孙丽杰、程建润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和组织工作；赵涛博士对本书的框架结构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目录

导论：从软实力到巧实力：美国霸权的反思……1

第一章 软实力理论概述……8

第一节 从老子到路易十三：软实力因素的历史探源…… 8

第二节 美国是否在衰落：软实力理论的提出…… 10

第三节 无形的力量：软实力的类型与特点…… 12

第四节 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新枝：软实力理论评析…… 20

第二章 国家软实力的构成…… 30

第一节 软实力的核心：国家的文化……30

第二节 软实力的政治化：国家的意识形态…… 33

第三节 软实力的拓展：国家的外交政策……35

第四节 软实力的国际化：国家对国际制度的掌控……39

第三章 国家软实力与硬实力…… 42

第一节 从炮舰到好莱坞电影：国家实力的历史变迁……42

第二节 精神与物质的博弈：国家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关系……45

第三节 另一只无形的手：国家经济力量中的软实力……48

第四节 钢铁的温柔：国家军事力量中的软实力……53

第五节 个案研究：冷战后美军软实力建设分析……59

第四章 国家软实力的评估及其他因素…… 65

第一节 从抽象到具体：软实力的评估……65

第二节 魔镜还是哈哈镜：软实力与国家形象……73

第三节 无冕之王：软实力与大众传媒……76

第四节 催化剂与倍增器：软实力与科学技术

第五节 国家的形象代表：软实力与跨国公司

第五章 亚太地区主要大国软实力剖析…… 81

第一节 霸权之翼：美国软实力剖析……81

第二节 曾经的辉煌：俄罗斯软实力剖析…… 111

第三节 菊花与刀：日本软实力剖析…… 125

第六章 中国软实力剖析……137

第一节 霸道与王道：中国软实力的历史变迁……13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二节 和谐与缺失：中国软实力的构成与不足……139
第三节 个案研究一：汶川地震与中国软实力
第四节 个案研究二：北京奥运会与中国软实力
第五节 个案研究三：食品安全与中国软实力
第六节 化干戈为玉帛：台湾问题中的软实力因素……147
第七节 龙腾东方：中国的和平崛起与软实力……151
结论……155
参考文献……162

◆导论

从软实力到巧实力：美国霸权的反思

2009 年 4 月 2 日，英国伦敦，G20 峰会。

在这场世界领袖的聚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光环，在金融危机中还没完全褪色，美国俨然还是“世界领导者”。但是，在 20 国集团峰会上，奥巴马以倾听者身份出现会更为恰当。美国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如何维持“霸”，而是如何救自己。奥巴马需要倾听，美国也需要倾听，需要反思。

其实，美国对于自己全球霸权地位的反思早已开始。受新保守主义影响的小布什上台后，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过分强调美国的硬实力，推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和“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招致世人不满，且根据多项最新民意调查数据显示，美国目前的国际形象正处于历史最低点[1]。因此，由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L. Armitage）和约瑟夫·奈领导的“巧实力（smart power）委员会”经过会诊美国形象下滑问题后，认为美国应该重新反思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聪明”的国家，并于 2007 年 11 月 6 日推出其研究成果——“巧实力”报告，试图为新一届美国政府提供战略参考，以重振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巧实力理论是对软实力理论的延续和超越，是结合硬实力和软实力之所长，超越“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实现从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到实现公共的善的转变[2]。巧实力报告中对巧实力的定义是“既不是硬实力也不是软实力，它是二者巧妙的结合。巧实力是要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发展一种相互协调的战略、资源库和工具箱来达到美国的目的”[3]。它不仅强调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重要性，而且也强调各项软性实力的重要作用，指出美国应该对各个层次上的联盟、伙伴和公共机构进行大力投资，以此扩大影响力并实现其在国际行动上从追求合理性到追求合法性的转变。因此，巧实力的思想核心就是

---

[1] 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 “CSIS 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 2007, p.17.

[2] 王义桅：“巧实力是大糊涂，美何时放弃领导世界冲动？”，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193&articleId=6844，2007 年 11 月 14 日。

[3] 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 “CSIS 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 2007, p.7.

将硬实力和软实力“聪明”地结合起来，将各自的长处发挥到极致，以改善美国形象，从而把世人拉拢到美国的一边接受美国的霸权。

美国至今仍陷入伊拉克战争泥潭，因此如何更好地发挥各种实力以取得伊拉克战争和反恐战争的胜利，从而重新树立美国的霸权地位，已成为美国国内广泛关注的问题。报告以“更聪明、更安全的美国”为标题，旨在将美国注意力从狭窄的伊拉克战争和恐怖主义上转移开来，从而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来关注美国的目标、战略以及在当今世界上的影响。报告在序言中称报告本身是关于实力以及美国如何在世界上运用实力的，并指出美国必须通过投资世界的善事才能成为一个“聪明”的国家。帮助世界上其它国家和人民获得所需要的东西是加强美国在国外声望的最好办法，因为既然世界受益于美国，自然就会接受美国的霸权，因此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应当是尽力延长并维持其作为善的代表的支配地位。报告指出美国投资世界的善事应该主要关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激活联盟、伙伴与国际多边制度，使之服务于美国的利益，应对21世纪的挑战。面对全球挑战，美国主要有三种方式可供选择，即单边主义，共识基础上的国际主义（Consensus-based internationalism）和准则基础上的国际主义（Norms-based internationalism）。近年来，在处理全球问题上，美国越来越偏离准则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原则，报告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因为准则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原则尽管要求国际机制和协议能够与时俱进以应付当今的挑战，但选择这种方式不仅能带来短期利益，而且能带来长期利益，这正是另外两种方式所很难达到的。冷战期间美国能够成功遏制苏联的扩张正是依靠了这种方式，对于目前的美国来说，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看，这种方式依然是最佳选择。因此，加强与国际机制的合作、进行新的多边主义政策乃是首选之举。

第二，关注全球发展，因为提高全球发展在美国外交中的分量能够帮助美国将自身的利益与世界人民的期望结合起来。美国政府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在全球发展问题上的态度变幻无常，这反映出美国联邦政府各个部门和机构的发展政策缺乏连贯的理论基础。因此，如果下一届政府想通过援助鼓舞别国人民，就应该发展一种更为统一的方式，并使美国人民相信在发展问题上进行聪明的投资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对美国来说，关注全球发展可以强化美国的基本价值观，促进和平、公正与繁荣，并能改善美国观察世界的视角。

报告认为关注全球发展，第一要务是着力解决全球健康问题。健康是发展的关键，也是人类和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以及建立国家间稳定关系的关键，所以下一届美国政府应当致力于建立一个全球健康网来改善全球的健康不平等现状。

第三，重视公共外交，通过建立长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青年人之间的关系，将世人拉到美国一边。报告认为有效的公共外交是改善美国形象和提高其在当今世界影响的关键。公共外交的目的是与他国的国民而非政府交流，它能够为美国的政治和价值观提供借鉴，并能帮助美国人更好地认知和理解美国以外的国家。因此，美国下一届政府应当加强对公共外交的资源投入，并且思考怎样改善机制才能使美国政府的公共外交努力更好地发挥作用。一个行之有效的公共外交方式必须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教育和文化交流而进行的思想、人才和信息交流，即所谓的公民外交（Citizen Diplomacy）。鼓励公民外交的一种途径是巩固和扩展美国大学和高中范围内的留学项目，除了鼓励美国学生到国外留学之外，下一届政府还应当致力于增加国外学生到美国学习和研究的机会。

第四，进行经济整合，虽然持续的参与到全球经济对经济增长和繁荣是必要的，但自由贸易的实惠必须拓展到国内外落后的民众。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最大的进出口国，也是接受国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全球贸易已经变成美国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关键因素。报告认为在美国享受到全球贸易的巨大实惠的同时，不应忘记那些由于全球化而失业的人们，下一任总统应当重新关注美国的国外援助，并且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发挥影响力引导它们援助那些受到开放市场影响的贫穷国家，而在国内方面则要重新检视对这些国家的贸易政策。

第五，进行科技与创新，因为能源安全与全球气候变化要求美国领导建立全球共识，提出创新解决方案。委员会认为解决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合理方法是科技创新，而这是美国一直以来做的最好的。下一届政府应当将政府、私营部门和社会大众三者结合起来共同讨论如何在碳受限（Carbon-Constrained）的世界中竞争。为了一个能拥有干净能源的未来，报告提出以下四种方案：一是为高级能源、安全和可持续性制定一个共同原则宪章；二是建立一个平台来支持碳受限经济；三是投资建立联合科技发展中心；四是建立能源高效产品和服务的全球自由贸易。

报告最后指出能否成功执行巧实力战略取决于政府的能力。但2007年的民意测验显示，六成的美国人认为凡是政府参与的工作，都是低效、多耗的；不仅美国国内如此，其它国家公民也认为美国政府效率低下且不负责任[1]。面对这样的信任危机，美国政府首先应当提高整合软、硬实力的能力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率。尽管如此，报告对美国制度和美国未来仍然充满信心，坚信美国有能力成为一个“聪明”的国家。



“巧实力”能否将美国从泥潭中救出？

巧实力报告从总体上来说是对布什政府新保守主义外交路线的总清算，全面否定其过分强调硬实力的强硬路线和“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软、硬实力理论的补充和改进。当今世界已发生变化，实力结构也需要发生相应变化以应付新的全球挑战。仅仅依靠硬实力已无法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样地仅有软实力也无法实现，因此巧实力提出将二者进行巧妙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二者的缺陷，有利于更大程度地发挥各自的优势。在对待恐怖主义的问题上，报告认识到 “9·11”事件以来，美国一直在输出恐惧和愤怒，而不是希望和乐观等传统价值，原因就在于美国已经把反恐战争作为其全球事务的核心部分。但是现在问题不是美国杀了多少恐怖主义分子，而是它赢得了多少同盟[2]。如果美国想保持其行动的合法性，就需要在使用武力打击暴力极端分子与其它反对恐怖主义方式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也就是说美国需要找到一个新的中心任务来取代反恐战争[3]，这样才能既

[1] Ibid., p.61.

[2] 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 “CSIS 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 2007, p.10.

[3] Ibid., p.10.

取得反恐战争的胜利又能重振美国国威。这反映了报告开始对布什政府滥用武力进行深刻反省，并积极寻求出路。而对于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报告也进行了批判，认为如果美国不顾世界的声音而继续一意孤行，将引发别国对其行动合法性的质疑和对其武力的恐慌，指出政府应当实行多边主义政策，这样比单方面推行其价值观能更有效地产生软实力和合法性。这些思想反映了美国智囊机构对国内问题的一种理性的思考，代表了美国国内一部分人的声音，即试图将政府视野从美国自身转而投向世界，重新审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多的关注世界本身[1]。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具有比较彻底的反省精神。但是，仅凭这样一份报告的出台也许并不能改变美国目前面临的各种困境。

首先，巧实力报告仍然没有摆脱美国领导世界的思维模式。报告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应当是尽力延长并维持其作为善的代表的支配地位[2]，但同时又提出“分享领导权”和“接纳崛起中大国”的观点。这种自相矛盾的思维模式导致报告一方面承认全球政治不是“零和游戏”，另一方面又得出“只有美国继续允许其吸引力衰退，中国才有可能取得支配地位”的结论[3]。这种前后相悖的观点反映出报告撰写人实际上并没有彻底抛却对美国领导权的追求和对美国优越感的迷恋。另外，无论美国如何强调延长其善的代表的支配地位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仍然只是从一个领导者的角度居高临下地考虑问题，并没有真正设身处地为他国着想。因此，美国最需要做的一是愿意倾听其它国家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二是给自己国家进行正确地定位。当今世界正日益多元化，美国必须学会保护和尊重世界的差异性，重新审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如果总是抱着优越感不放，一味追求领导地位，而认识不到时代背景的改变和目前问题的制度根源，那么再好的理论也将是无济于事[4]。

其次，报告对美国日益下滑的国际形象的原因诊断不足，甚至有偏差。报告认识到美国国际形象下滑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美国对“9·11”事件的反应，

---

[1] 王义桅:《巧实力是大糊涂，美何时放弃领导世界冲动？》，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193&articleId=6844，2007 年 11 月 14 日。

[2] 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 “CSIS 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 2007, p.5.

[3] Ibid., p.26.

[4] 王义桅:《美国“巧实力”是大糊涂，美何时放弃领导世界冲动？》，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193&articleId=6844，2007 年 11 月 14 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